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Groups Strategies
and Responses



解读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

(第三版)

[美]詹姆斯·M.伯兰德 (James M. Poland) / 著

王震 / 译



海外学



解读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

(第三版)

[美] 詹姆斯·M.伯兰德 (James M. Poland) / 著

王震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 / (美)詹姆斯·M. 伯兰德著; 王震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走近美国)

书名原文: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ISBN 978-7-5520-2379-4

I. ①解… II. ①詹…②王… III. ①反恐怖活动—研究—世界 IV. ①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761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05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GROUPS, STRATEGIES, AND RESPONSES, 3rd Edition by POLAND, JAMES M.,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Copyright © 2011,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ACADEMY SOCIAL SCIENCES PRESS, Copyright © 2019.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解读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第三版)

著 者: [美]詹姆斯·M. 伯兰德

译 者: 王 震

责任编辑: 张 晶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3

字 数: 38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379-4/D·495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芭芭拉、迈克尔和阿曼达

国际反恐的困境与反恐研究(译者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信息化时代,更是一个恐怖主义肆虐的时代。

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不断升级的国际恐怖活动便是其中之一。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反恐报告,即便在发生“9·11”的2001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仅为348起,造成的全部伤亡人数为4655人。¹10年之后的2011年,全球范围内的恐怖袭击数量已上升至10283起,因恐怖袭击而丧生的人数为12533人,受伤人数为25903人,被绑架者为5554人。²到2015年,全球恐怖袭击案件进一步增至11774起,共造成28300人死亡,35300人受伤,另有12100人被绑架或被劫持为人质。³换言之,2015年全球平均每月发生981起恐怖事件,案发频率和造成的伤亡程度都大大超过了“9·11”之前,这就是不少媒体和学者所谓的“越反越恐”现象。

除了恐怖活动的“井喷式”爆发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像“伊斯兰国”这样既有别于“基地”组织等传统恐怖组织,又不同于传统割据武装势力的“超级怪胎”。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曾感叹称:这是一个“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它“既是一个恐怖组织,又是一个准政权,同时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政治运动”。⁴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快速转型与升级,任何一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都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在全球“反恐战争”开展15年之后,国际社会反而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9·11”以来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努力何以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与国际恐怖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反恐战略和反恐研究?这些问题都亟待我们做出回应。

一、“越反越恐”的根源

造成当前全球“越反越恐”局面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并非某个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究其根本,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与此有关。

(一) 美国在“9·11”后的一连串战略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际恐怖活动的升级和扩散。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自身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威望一方面动辄以“世界警察”自居,另一方面却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长期奉行“一边倒”的亲以色列政策。作为巴以冲突中的弱势一方,巴勒斯坦人的正当利益和诉求长期被漠视和压制,由此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引发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为此后极端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由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发动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迅速向全球蔓延,其根源正在于此。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更是将其首要目标认定为“犹太人和美国人”。面对“9·11”事件这一悲剧,被激怒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旋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报复性行动。为此,小布什总统不仅公开将其定义为一场“战争”(War),并宣称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世界各国“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⁵在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其主要手段不外有二:

一是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消灭恐怖分子。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军事手段在消除恐怖分子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但同样需要承认的是,美国的军事反恐行动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消极后果。小布什政府借助冷战后美国新一轮军事变革和国防转型所确立的绝对军事优势,试图将反恐战争与其全球霸权战略结合起来,从而使反恐战争的目标被严重“扩大化”了。阿富汗硝烟未散,美军便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开进了巴格达,最后却形成了两地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奥巴马上台之后,不得不宣布逐步从两地撤出。然而,美军刚于2011年底从伊拉克撤军,2013年“伊斯兰国”便乘势崛起。与此同时,大规模军事反恐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恐怖活动的迅速升级。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9·11”后最初几个月里,美国已经打垮了阿富汗“基地”组织80%的武装力量,包括其核心领导层,但同时也导致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从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跨国恐怖组织转型为松散而广泛的全球性“圣战运动”。⁶由于“9·11”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防范,恐怖分子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无差别袭击”,防范较弱的民用目标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

二是通过所谓“民主化改造”,消除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暴力的社会土壤及其思想根源。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小布什总统在美国民主基金会(NED)成立2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60年来,西方国家迁就和适应中东缺乏民主的做法并未带来安全。追求稳定并不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只要中东依旧缺乏

民主,它就仍然是一个输出落后、怨愤和暴力的地区。”⁷无论是美国在“9·11”后推行的“大中东计划”,还是奥巴马在“阿拉伯之春”后对于阿拉伯世界政治反对派的支持,从根本上都基于通过民主化改造来消除中东激进主义思潮这一反恐理念。“伊拉克危机”则充分表明:“9·11”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大力推广的“选举式民主”存在着严重“水土不服”现象,因为它无法解决当地长期存在的教派矛盾和部族冲突。由于这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社会,民众对于政治的忠诚不是依照政党和政治立场进行画线,而是根据传统的教派、种族和部族等来进行分野。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无法形成足够的政治共识,这就会导致失势的一方,也即政治少数派的诉求很难通过选票来实现。当这些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正当诉求无法在体制内获得满足时,就只能通过制度外途径——军事反叛乃至恐怖暴力来解决,这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和动荡之中。⁸换言之,美国虽然积极谋求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但中东政治的发展进程却完全超出了美国决策层预料,不仅未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反而为新一轮恐怖活动回潮提供了契机。

(二) 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变革为恐怖活动的升级与扩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和活动平台。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及其应用领域的变革大多与暴力冲突和战争有关,战争往往是推动装备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最原始动力。同样,科学技术进步又往往会带动暴力手段和恐怖战术领域的变革。比如,早期的恐怖分子只能使用刀、剑等冷兵器作案,随着炸药、枪械等热兵器的出现,特别是半自动、自动枪械,定时炸弹、塑性炸药等的出现,恐怖分子的袭击战术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便于携带的塑性炸药出现后,中东地区恐怖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广泛地使用邮包炸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汽车炸弹和自杀性袭击开始成为恐怖分子手中最为有效的武器。到目前为止,这类恐怖袭击仍然是令人防不胜防的恐怖手段。推动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快速升级的技术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

首先是空前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大大拓展了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类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延伸,人类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与此同时,发达的交通工具也极大地拓展了恐怖势力所能触及的地理范围,跨国恐怖活动也因此变得更加便利和常见。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当代恐怖分子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目标地点,完成任务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这只是在最近才有可能。”⁹

其次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全新的活动平台。对于当代恐怖组织来说,网络技术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恐怕都不为过。网络社交媒体不仅为恐怖分子躲开监管部门的追捕并跨越国界进行宣传、招募、融资、策划、联络等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开展信息战的全新平台。无论“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都设立了专门从事信息战和宣传战的职能机构,通过有选择、有计划地对外发布信息来实现其战略目标。正是借助网络平台,“伊斯兰国”有效地吸引了全球数以万计的“圣战者”源源不断地奔赴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并成功地避开了各国边防和执法部门的监管。诚如军事科技史专家马克斯·布特所言,信息革命等技术变革正在“重塑战争”,因为它们可以使“小国和亚国家组织获得重创强大民族国家的能力”。¹⁰

最后,网络媒体、数字传输技术、可视性媒体技术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恐怖分子进行全球宣传提供了空前便利。对恐怖组织来说,杀戮往往并非最终目标,以杀戮引起社会轰动,让更多人了解其真实诉求和抱负才是最终目的。媒体对于恐怖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不仅会让与之有关的恐怖组织和个人一举成名,还会在国际社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示范效应”。比如,正是在“9·11”后各国媒体不厌其烦的报道下,“基地”组织头目和创始人本·拉登才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恐怖大亨”。而“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则认为,媒体是“非常有效的武器”,其影响力可以超过最具威力的炸弹,进行宣传甚至“比开展军事圣战还重要”。¹¹

(三) 冷战后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不仅催生了更多恐怖主义,也为恐怖活动的全球化提供了全新平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本身似乎并无太大异议,但对全球化定义及其影响的分析却见仁见智。国内学者蔡拓指出,所谓“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¹²换言之,全球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推动冷战后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世界市场和跨国资本固有的扩张性冲动,以信息技术为首的新一轮技术变革,以及冷战终结后东西方对峙局面的消失,等等。¹³全球化不仅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还对传统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内政治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人类社会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一轮经济繁荣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跨国犯罪活动,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全球化对于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在经济领域,由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资本和自由市场的扩张,在此领域占据优势的西方国家从中获益更多,从而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南北收入差距“并不直接导致恐怖活动,但它为这些活动得以扎根和滋生提供了条件”。¹⁴在政治领域,一方面是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国家的学习与趋同,另一方面是强势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打压和改造。尽管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优势的某些西方大国继续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粗暴地将其他国家划为“资恐国家”“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等,为所欲为地在全球进行“政权更迭”和“人道主义干预”,或是对其他国家发动各种制裁,从而引发了强烈的仇恨和不满。正像有学者所言:“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不满情绪,常常由于他们在西方国家行为中看到的不公正、对他们苦难的漠视,以及在国际上翻云覆雨、实行双重标准而得到加强,从而在形成反抗意识甚至道德观上起了很大作用。”¹⁵在社会文化领域,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使得不同族群和个体之间发生文化冲突的概率随之增多。尤其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民族文化特性,往往处于不得不接受又不得不抵制两难困境。这也是在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社会上具有强烈的反美和反西方情绪,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可口可乐、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等西方流行文化又大行其道的原因。

二、全球反恐的困境

面对“9·11”以来“越反越恐”的局面,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却一直面临着重重掣肘,举步维艰。一些现有的反恐政策要么应对乏力,要么偏离了靶心而无的放矢。一般来说,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不外乎两种路径:一是加强自身防范,通过安全防范来减少恐怖分子成功的机会;二是通过主动的军事打击与国际合作,包括在境外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来防患于未然。前一种做法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后一种主要是美国、以色列等国所采取的反恐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因为无视别国利益和主权而备受争议。概而言之,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能够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从而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行动。

如何界定“恐怖主义”及其罪行?这不仅是学者们从事相关研究的“逻辑起

点”，也是执法部门打击相关犯罪活动的根本依据，更是国际社会开展反恐合作的重要前提。然而，正如本书作者伯兰德所言：“尽管几十年来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¹⁶恐怖主义现象之所以难以获得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欧几里得式”定义，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各国现实中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判断的问题”。¹⁷“9·11”发生后不久，联合国大会便通过了成立“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的决议，并试图推动达成一个能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反恐公约。但是，这一努力至今尚未取得任何结果，其最大障碍便是各国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的分歧。比如，以色列和欧美各国往往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视为恐怖主义加以谴责，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应当区分恐怖主义和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攻击是“正义”斗争，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则是“国家恐怖主义”。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曾指出：“我们一贯反对恐怖主义。但是恐怖主义是一回事，反对占领的民族斗争是另外一回事。”1998年阿拉伯国家联盟一致通过的《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各国人民具有使用一切手段反对外国占领和侵略的权利，包括开展武装斗争以解放其领土，争取自决权和独立权……”¹⁸

(二) 由于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和动机各不相同，它们对待国际反恐合作和国际恐怖活动的态度往往千差万别，从而给国际恐怖分子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

首先，一些国家为了减少参与国际反恐战争可能带来的恐怖报复成本，或是得罪国内某些社会群体，往往拒绝就某些恐怖事件和极端组织进行公开定性、表态，或谴责。比如，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在反恐问题上比较积极，而其他境内拥有庞大穆斯林群体的国家对此则并不热心，甚至否认其境内存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其次，一些国家为了减少恐怖事件对其国内政治或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不愿承认境内发生的某些恐怖袭击。比如，2015年10月31日，俄航9268航班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后，各国航空公司纷纷取消了前往埃及的航班或是调整原有航线。出于对本国旅游业收入的担心，埃及政府曾一再否认该事件为“恐怖事件”，并希望外界不要对此“妄加揣测”。最后，一些民族国家为了一己之私而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表里不一的“双重标准”政策。“9·11”以来，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过街老鼠”，很难想象哪个国家敢于公开和恐怖组织联手合作。但是，表面上的官方辞令有时候并不代表其真实行为，所以学术界才会有“一方的

恐怖分子是否是另一方的自由斗士”的疑惑与辩论。所谓“双重标准”，就是对人对己采取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尺度。这一现象并非始自今日，1978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国 and 沙特等国先后投入数百亿美元，从西亚、北非、东非以及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招募了大约3.5万名穆斯林前来参加所谓的“圣战”，并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界地区对他们进行“圣战”动员和军事训练。一位曾受命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前英军特种兵指出，阿富汗抵抗运动中的“毕业生”最终演变成当今最为令人头痛的恐怖势力，因为“像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恐怖人物，都是由于有了美国中情局的训练计划而学就了一身本领”。¹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是当今西方国家“双重标准”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对华“双重标准”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不认同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认定；二是不认同中国政府对于国内恐怖主义现象的解释，而是简单粗暴地将其与民族、宗教，乃至人权问题挂钩。除了“东伊运”(ETIM)之外，美国不仅拒绝将其他“东突”恐怖组织列入其反恐黑名单，甚至还对中国境内的一些暴恐活动和《反恐法》说三道四。美国迟迟不愿承认中国境内一些暴恐案件的态度与中国在2001年“9·11”事件和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后的积极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像俄罗斯《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所说，西方国家奉行短视的“双重标准”政策，把恐怖分子划成对自己有利和不利两类，最终“加剧了国际恐怖主义对全球的威胁”。²⁰

(三) 由于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洼地效应”和“挤压效应”，国际恐怖势力总是倾向于在全球反恐的薄弱地区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给国际反恐领域的全球治理带来了更大挑战。

所谓“洼地效应”和“挤压效应”，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国际恐怖势力就像无形的流水一样，在面临局部反恐压力的情况下，总是更容易流向安全防范薄弱、极端思想浓厚、同情者和支持者较多的“反恐洼地”。于是，一些社会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滞后、宗教思想保守，尤其是那些经历动荡和内乱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开始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重灾区。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恐怖主义年度报告》，自2012年以来，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四国一直名列全球恐怖袭击排行榜前四名，紧随其后的尼日利亚、也门、叙利亚、埃及、菲律宾等国同样为发展中国家。²¹当然，这并不是说欧美发达国家的恐怖活动已经消失。事实上，欧洲和美国近年来也多次发生各类恐怖袭击或未遂恐怖案件。但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

家遭遇的恐怖袭击案件要远远多于欧美发达国家,造成的伤亡和损害也往往高于后者,只是发生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恐怖袭击案件往往无法引起足够的国际关注,更容易被人忽视和遗忘。

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后,部分阿拉伯国家陷入了内战和长期动荡之中。于是,全球跨国“圣战”运动的重心开始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逐步向西移动,叙利亚和与之毗邻的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地区开始成为全球“圣战”武装分子的主要战场。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组织逐步取代了“基地”组织,开始成为全球“圣战”运动的新“旗手”,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30多个极端暴力组织先后向其宣示效忠,其势力遍及中东、非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在反恐领域还远未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这些反恐能力相对较低的“反恐洼地”也就成了跨国恐怖组织继续扩张并危害人类社会的新场所。

(四) 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暴力形式和冲突策略,现代民族国家在应对此类现象时并没有天然优势。

大多数民族国家在发展本国军事力量时往往着眼于常规军事冲突,而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性”的超常规暴力冲突。因此,民族国家利用常规军事力量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并无多大优势,很容易形成“高射炮打蚊子”的局面。而且,对于藏在暗处的恐怖分子来说,采取“以暴易暴”的反恐策略很容易造成连带性伤害,引发更多的仇恨和暴力。与此同时,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犯罪活动,而是有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诉求,尤其是当前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开始寻求披上“圣战”外衣。对于此类具有强烈宗教意识形态色彩的恐怖活动来说,现代民族国家所追求的世俗主义生活方式和现代化模式同样没有多大优势。比如,在“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之类的恐怖势力看来,正是“糜烂不堪”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玷污”了伊斯兰世界,因此应当被彻底清除,进而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法“沙利亚”治理的伊斯兰社会。

正因为面临上述一系列困境,“9·11”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实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形成了前述“越反越恐”的局面。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纷纷吸取了全球反恐战争的经验教训,逐步调整了各自的反恐战略,由此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反恐战争转型,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²²：

一是国际社会的反恐理念更趋理性和成熟。各国反恐战争的目标已从早期追求在肉体上消灭恐怖分子转变为致力于消除造成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社会、宗

教与思想根源,反恐手段也从早期单纯依靠军事武力逐渐转变为追求标本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2015年初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一个聪明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从长期来看,美国及其盟国共同打击造成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和意识形态远比在战场上有能力清除恐怖分子更加重要。”²³英国前内务大臣特蕾莎·梅在2016年初的一次演讲中更是将阻止“激进化”(radicalization)作为英国反恐政策的四大支柱之一,她认为“如果不能消除造成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猖獗的环境,我们在反恐中就会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²⁴

二是全球反恐战争正从“有形的”传统物理空间向“无形的”心理和网络领域快速拓展。如果说“9·11”事件发生初期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主要集中于物理和地理层面的话,如今这一反恐斗争正在向网络空间和思想意识层面快速拓展。国际社会在此领域的努力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致力于消除形成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思潮和社会土壤,防止更多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的潜在招募对象,其做法包括前文提及的宗教领域去极端化、促进族群和谐,以及帮助特定群体重新融入社会等;另一方面开辟新的作战领域,如实施网络战、心理战和信息战等,以便更有效地打击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圣战”势力。

三是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联合国在全球反恐领域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强化;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开始日益重视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权威和作用。2015年底在土耳其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在关于反恐问题的声明中一致同意,将在未来的反恐斗争中“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中心作用,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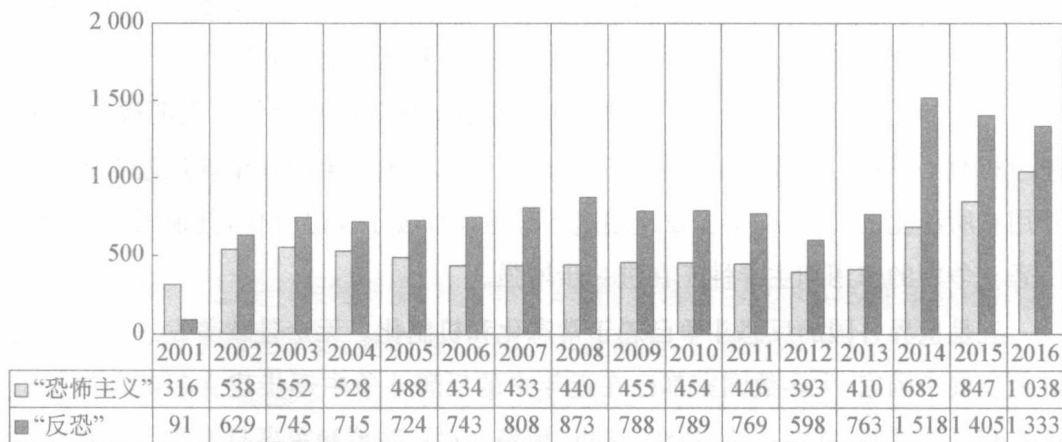
四是“9·11”事件后基于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国际反恐合作正逐渐被自发的、基于相对平等和自愿原则的国际反恐合作所取代。虽然美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作用有所淡化,但国际社会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反恐合作,其他国家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和主导性正在进一步增强。

五是世界各国的反恐斗争已趋于常态化和机制化。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已在近年来的反恐斗争中逐步建立起各自的反恐体系和反恐战略,并在立法、执法、情报、预警、应急、防范和军事打击等领域建立了系统的反恐工作机制。显然,在制度惯性和反恐战争的双重影响下,这种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三、国内学界的探索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改此前相对低调的立场,积极地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全球反恐战争当中,国内学术界也随之兴起了一股研究恐怖主义的热潮。2001年以来,有关恐怖主义与反恐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发展最快,也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在国内著名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恐怖主义”作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显示,从1991年9月到2001年9月,有关恐怖主义的文献篇目共279条,而以“反恐怖”或“反恐”为关键词的搜索显示结果均为0。从2001年1月到2011年1月,以“恐怖主义”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文献共4654条,以“反恐”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文献数量为6923条。²⁶对另一家国内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WANFANG DATA)的搜索显示:1991—2001年,以“恐怖主义”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文献数量为1182条,以“反恐”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1252条;2001—2011年,以“恐怖主义”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文献数量为2730条(其中期刊论文数量1284条,学位论文数量265条),以“反恐”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3270条。²⁷事实上,这还远远不是全部内容,如果把那些未被这些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比如论文集、译作、专著章节或未出版的研究报告、论文等),以及那些并未以“恐怖主义”或“反恐怖”作为标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内的话,整个数量可能会翻上一番还不止。²⁸显然,无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反恐研究的文献(2001—2016年)

说明:“恐怖主义”是指以“恐怖主义”作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反恐”是指以“反恐”作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的文献数量,搜索时间为2017年3月12日。

论从哪个角度来看,2001年后国内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笔者在2014年底提交给我国台湾地区第十届“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中曾专门就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²⁹总的来说,造成国内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热潮的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首先,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9·11”事件极大地震惊了国际社会,不仅促使一些世界大国调整了外交与安全战略,也激发了国际学术界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热情。对此,已有国外学者指出,“9·11”后国际学术界研究恐怖主义的成果数倍于前。³⁰甚至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的研究范式与重心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开始呈现出“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d)趋势,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生、化、核与放射性恐怖主义(CBRN),包括自杀性恐怖主义和“圣战”恐怖主义等也开始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³¹毫无疑问,这一新的国际学术动向不可避免地会传递到国内学界。

其次,“9·11”事件后来自民众和官方的知识需求也在客观上助推了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热潮的形成。在“9·11”事件之前,国内民众和媒体对于恐怖主义相关知识了解非常有限。“9·11”事件发生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于恐怖主义知识的兴趣和需求都大幅增加,尤其是媒体对于国际恐怖活动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广大民众对恐怖主义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参与国际反恐斗争过程中更是需要大量知识储备为其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从而形成了对于恐怖主义知识和信息的强大需求。由于之前几十年对于恐怖主义研究的严重忽视,国内学界对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和知识储备非常贫弱。于是,强大的现实需求和知识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激发了学术界对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热情,形成了学术界研究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的重要动力。

最后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倾向。在当下学术生态中,不少学者对于评职称、评奖和获取课题经费等现实问题的考量往往压过了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本身。在现实需求和知识供给出现不平衡的情况下,许多人出于功利主义考虑就会选择更容易获取各类资源的恐怖主义研究,加上当前国内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门槛相对较低,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学界研究恐怖主义的“热潮”。³²关于当前中国的“学术泡沫”现象,国内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事实上，这种实用主义导向在相关学术研究中也多有体现，比如既有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远多于对理论问题、基础性问题的探讨，等等。这一特征既与恐怖主义问题的现实性存在关联，也与当前中国学术生态和传统历史文化存在联系。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经世致用”往往是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精英文化，还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担当都是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此外，在2001年以来的恐怖主义研究热潮中，有相当一部分非专业人士也参与了相关研究。无论是源自个人利益和兴趣的驱动，还是工作需要和其他因素影响，各路大军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的视野，也助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繁荣”。不过，这也同时意味着相当多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借鉴和应对”层面，无法从更深层次进行学理性探讨，也无法在理论层面和基础研究层面取得更大进展。以至于有学者曾撰文批评说，除了一些“鲜有创意”的简单重复外，“个别非相关专业人士以不大严肃的态度参与其中”。³³

总的来说，尽管目前国内反恐研究领域良莠不齐，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其价值和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国内学界和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也在客观上满足了“9·11”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反恐斗争的政治和社会需求，为中国政府制定反恐政策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相应的学理支持；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构建的“全球反恐”话语体系和话语霸权面前，中国学者在恐怖主义和反恐领域的研究不仅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和立场，也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汉语学术界对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四、詹姆斯·M. 伯兰德与本书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在恐怖主义和反恐领域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内容宽泛、成果扎实，其中不乏优秀的经典之作。詹姆斯·M. 伯兰德所著《解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一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关于本书作者詹姆斯·M. 伯兰德，目前我们所知非常有限。只知道此公曾长期从事犯罪学、刑法学与反恐问题研究，并担任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刑法学院教授。詹姆斯·M. 伯兰德一生著述似乎并不多，除了早年发表的一些零星的学术论文和本书之外，还曾与同为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刑法学教授的迈克尔·麦

克莱斯托(Michael J. McCrystle)合著有《恐怖主义与人质劫持的实践、战术和法律研究》。《解读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策略及其应对》一书最早由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于1988年2月出版,随后于2000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了再版,本书便是以2010年作者修订后的第三版为基础翻译而来。

詹姆斯·M.伯兰德撰写本书的初衷是为其学生或刑法领域的从业者们提供一本深入浅出的教科书。然而,该书无论是在理论深度、学术价值,还是在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一本普通教科书所承载的内涵。因此,该书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并且被屡屡再版和重印。在林林总总的反恐研究作品当中,伯兰德这一著作的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够秉持相对理性客观的立场来看待恐怖主义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各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和出发点存在差别,国际社会始终难以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中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上的分歧。然而,正如伯兰德在书中所言,现代恐怖主义的高涨与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成功不无关联。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又源于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垦殖运动所引起的阿犹矛盾,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宣布建国之举。遗憾的是,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引起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这一历史和现实根源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9·11”事件发生后,在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似乎又成了蒙面持枪的“恐怖分子”的代名词。笔者无意在此探究巴以双方的历史恩怨与是非曲直,因为这既非本文的主旨所在,也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厘清,但这种扭曲的叙事模式显然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今肆虐全球的恐怖主义现象。伯兰德在书中系统地追溯了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起源,其中不仅包括派系林立的各种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还包括早期犹太人反抗英国托管统治的地下武装组织。他在书中毫不讳言,在美国招致恐怖袭击的诸多因素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美国对犹太国以色列的支持”。尽管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证明恐怖主义手段的正当性,但造成巴以冲突的这一根源性因素决定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对以色列而言,虽然已经成为拥有核武器的中东超级军事强国,却依然无法根除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因为“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只能带来暴力和恐怖主义”。³⁴

二是将理论与反恐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既不失理论思考的深度和广博,又不乏对社会现实和反恐实践的启发意义。一般来说,反恐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